



十年历程：我国职业教育政策研究的热点与回望

——基于 2010—2020 年核心文献的可视化分析

张毛毛, 张嗣德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 职业教育学院, 天津 300222)

摘要 职业教育政策作为特殊分配的教育资源,对其研究的梳理将对职业教育政策的未来发展起指导和管理作用。以中国知网(CNKI)北大核心和 CSSCI 数据库中 2010—2020 年的文献为数据来源,通过文献计量法和可视化知识图谱法对发文量、研究作者、关键词进行统计分析和科学知识图谱绘制,研究结论如下:近十年间,该领域的发展速度和学者的关注度总体提高;核心作者的类型主要为高校教师或科研人员;所在的机构大部分为大学和科研院所;有七大研究热点脉络:职业教育政策的历史嬗变及影响因素、变迁逻辑、中职教育政策、产教融合政策等;未来研究应推进不同研究者、机构、地域间的合作与资源共享,理论研究对位于实践需要,在比较本国与他国发展要素的基础上介绍发展经验。

关键词 职业教育政策;知识图谱;关键词;聚类

中图分类号: G719.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931X (2022) 03-0017-10

DOI: 10.19899/j.cnki.42-1669/Z.2022.03.004

一、背景分析

近十年间,我国职业教育取得的跨越式发展有目共睹,背后是一系列职业教育政策的支持,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到2020年,形成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要求、体现终身教育理念、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1],《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重申了校企协同育人的宗旨、目标、实施方式及配套保障,《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

方案》明确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2]等。

职业教育政策是一种特殊分配的教育资源,对其研究将对职业教育政策的未来发展起指导和管理作用。即“没有研究的教育政策不可能成为好的教育政策”,现有研究主要有以下二个面向:一是梳理具体职业教育政策的研究现状;二是梳理职业教育整体研究现状,这些研究成果加深了我们对职业教育政策研究领域的认识,但研究内容上未对近十年间整个领域的研究热点脉络具体展开,没有对职业教

收稿日期:2022-05-25

基金项目:2021年天津市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生命历程视域下我国世界技能大赛获奖选手的成长轨迹研究”(项目编号:2021YJSS213)。

作者简介:张毛毛(1996—),女,安徽宿州人,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职业教育学院2020级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教育学、职业技术教育学;张嗣德(1994—),男,辽宁海城人,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职业教育学院2020级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教育心理学、技能学习。

育政策研究热点内容的梳理、反思和评价,不能发现目前研究的薄弱之处,进而完善与拓展。

基于此,本研究采用文献计量法和可视化知识图谱的绘制,目的在于梳理近十年间职业教育政策领域的研究发展速度、核心作者分布、合作状况及所属机构的类型和区域、探寻研究热点脉络并进行未来走向的展望。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采集及处理

数据来自中国知网的“北大核心”和“CSSCI”数据库,检索条件为“主题=职业教育政策”,对2010年1—12月发表的学术期刊论文进行检索,共得到591条结果,因本研究借助CitespaceV进行文献关键

词的共现和聚类知识图谱分析,在检索结果中由两位参与者共同剔除述评、书讯、报告等无关键词、非学术性文献,保留有效记录521条,以“Refoworks”的文件形式导入至CitespaceV中。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文献计量法计量发文量的年度分布、核心作者的发文量和关键词的频次、中心性,采用科学知识图谱法——由中国大连理工大学和美国德雷塞尔大学陈超美教授团队开发的、当前应用最为广泛的知识图谱软件CitespaceV^[3](版本5.8R3)绘制研究作者合作图谱、关键词共现图谱及聚类知识图谱,以探寻近十年间该领域学者的关注度和研究发展速度、核心作者分布和合作关系、研究热点脉络状况,进而进行反思和展望。如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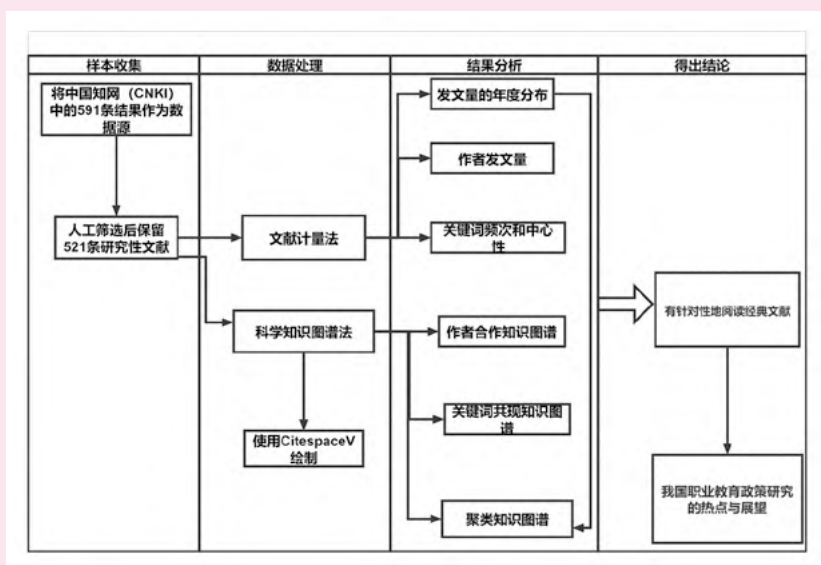


图1 研究设计框架图

三、我国职业教育政策研究的年度发文量分布

发文量代表一个领域的研究发展速度与学者关注程度^[4],对年度发文量进行计量统计(如图2),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10—2014年的急剧波动期,发文量呈现上升、下降又上升的趋势,虽浮动较大,但总体发文增加。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强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颁布^[5],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快发展职业教育作出重要指示,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激发学者不断攀升研究热度,发文量是此阶段的最高值52篇。

2015—2017年为快速增长期,这三年发文量不间断增长,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出台,旨在激发职业教育活力,“校企行”多元主体参与办学。这一时期,关于产教融合政策的研究在宏观政策的指引下如火如荼地展开,

2017年发文量达到近十年的顶峰63篇,缓慢下降期为2018—2020年,发文量有所下降,但年均发文量54篇,仍高于前三年的年均发文量52篇。职业教育政策研究在此阶段稳中有进,且逐渐放缓步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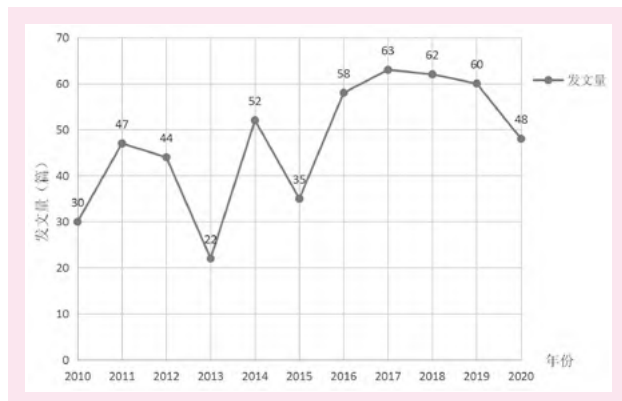


图2 发文量的年度分布图

四、我国职业教育政策研究的作者及所属机构分析

运行 CitespaceV, 将计量得出的高频发文作者整理情况见表 1, 该领域发文量最高、研究时间最长的作者为祁占勇, 总发文 22 篇, 研究时间横跨整个十年。其被引量最高的文献为《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的变迁与展望》^[6], 梳理了自改革开放以来产教融合政策经历了初步探索、多元创新、不断深化的三个发展阶段及演进特征, 并提出从建立联动的工作机制、设立专门法律保障、政府企业共同创新治理模式等方面促进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的落地实施。

普赖斯公式 $N=0.749(N_{max})^{1/2}$ 是界定核心作者的常用方法^[7], N 为核心作者最低发文量, N_{max} 为该领域作者最高发文量^[8], 即发文量在 5 篇及以上的作者为核心作者, 该领域共有 9 位, 见表 1 所示, 作者类型中科研人员和高校教师占大部分, 与政策实践联系最为密切的职业院校教师零零星星, 只有一位所属浙江金融职业学院的周建松教授, 核心作者所属单位同样大多为高校或科研院所, 职业教育政策实施“最后一公里”的职业院校“形单影只”。核心作者分布的区域中, 东部最多、中部次之、西部最少。

由 citespaceV 得到作者合作知识图谱(如图 3), 作者名字的大小代表发文量, 作者之间的连线代表合作关系^[9], 建立过合作关系最多的作者是祁占勇, 他与王佳昕、王志远、王羽菲、王晓雪等九人都进行过合作, 该领域还有孙翠香和庞学光、徐桂庭和孙琳、

周明星和周雨可等八个两人合作团体, 但总的来说, 大多数作者为独立作者, 合作较少, 不利于该领域形成研究聚合力。在未来研究中, 可从促进作者间的合作提升资源共享与减少重复研究。

表 1 核心作者及所在机构表

序号	作者	发文量	作者职称	所在单位	区域
1	祁占勇	22	教授	陕西师范大学	西部
2	石伟平	10	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	东部
3	孙翠香	7	副教授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	中部
4	郭扬	6	研究员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东部
5	李玉静	6	研究员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	东部
6	徐桂庭	6	助理研究员	中国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	中部
7	和震	6	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	中部
8	曾家	5	讲师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东部
9	周建松	5	教授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东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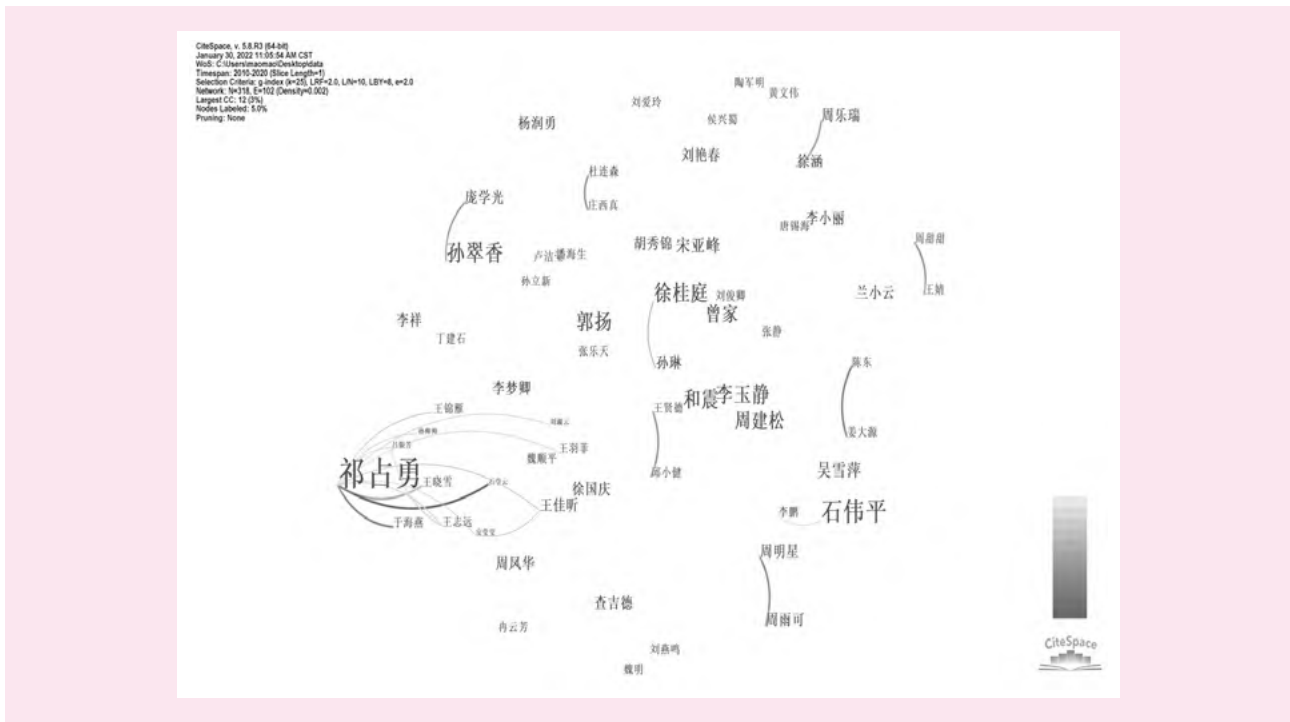


图 3 我国职业教育政策研究的作者共现知识图谱

五、我国职业教育政策研究的热点分析

(一) 关键词共现分析

关键词是一篇文献主要内容的概括及主旨的精炼表达,是核心内容的架构,若一个关键词在某一主题的文献中多次出现、频次较高,则可被视为该主题的研究热点^[10],关键词^[10]的中心中介性说明关键词在共词网络中的影响度^[11],也可作为研究热点的判定,如果一个关键词频次较高,但中介中心性是0,则说明它与其他关键词没有联系^[11],不能作为关键节点,一般视中介中心性在0.1以上的高频关键词为研究热点。

由CitespaceV得出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如图4所示,彩色年轮的直径长短表示关键词的频次高低,关键词频次越高,年轮直径越大,关键词之间的连线表示两个关键词曾在一篇文献中共现过,连线的粗细表示共现强度,连线越粗,共现强度越大,使用Excel表对频数排名前十和中心性大于0.1的关键词导出(见表2),关键词频次之和为377,频次和中心性都较高的关键词是职业教育、政策、教育政策、校企

合作、产教融合、价值取向、政策工具、政策变迁、公平。这9个关键词的词义较为宏观,需进一步绘制聚类知识图谱,并阅读重点文献,从而梳理近十年间的热点脉络。

表2 高频关键词和高中心性关键词统计表(排名前十位)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序号	关键词	中心性
1	职业教育	183	1	职业教育	0.73
2	政策	58	2	政策	0.13
3	教育政策	36	3	教育政策	0.12
4	校企合作	28	4	价值取向	0.07
5	产教融合	23	5	校企合作	0.06
6	价值取向	14	6	产教融合	0.05
7	政策工具	13	7	政策工具	0.03
8	政策变迁	9	8	演进逻辑	0.03
9	发展	7	9	政策变迁	0.02
10	公平	6	10	公平	0.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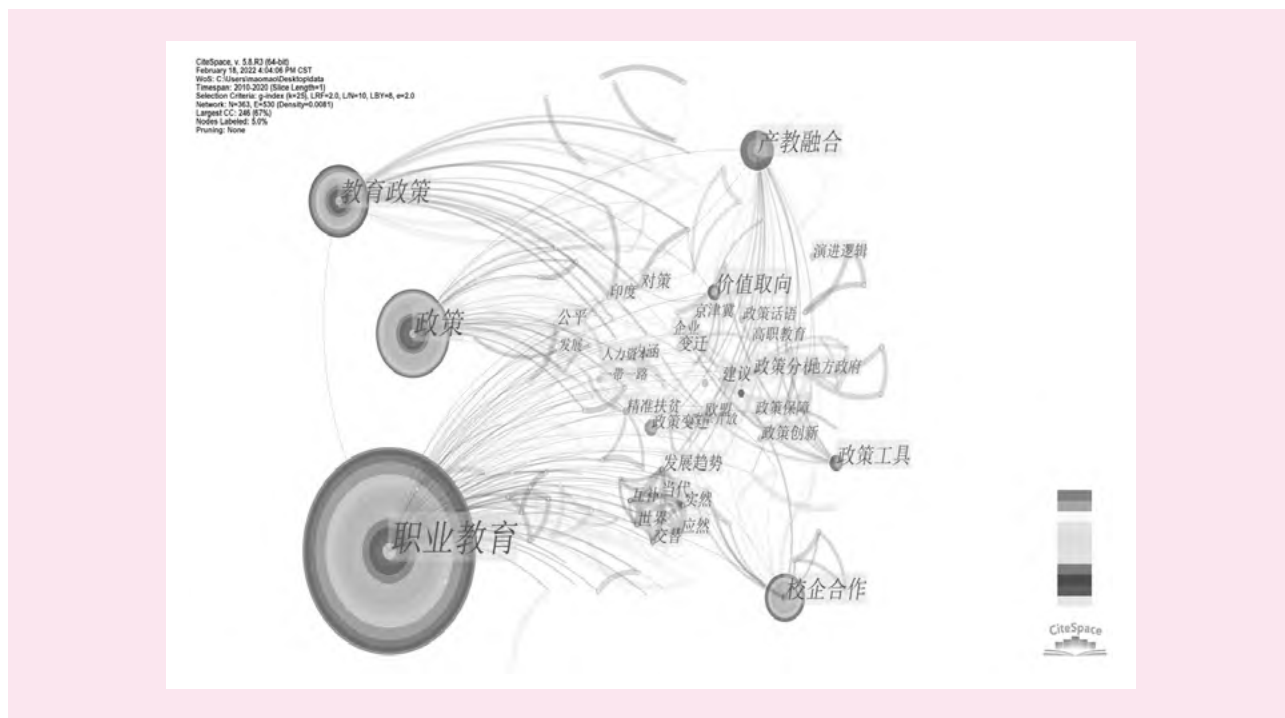


图4 我国职业教育政策研究的关键词共现图

(一) 关键词聚类分析

聚类是对属于同一类别或相近的关键词进行聚集,进而深入地反映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通过关键词聚类图谱的绘制,可深入强化科研的核心方向^[12],进而获得更多有关的结论和类团,从而对已有结论体系起到一定的填充作用。通过CitespaceV以Long

Likelihood Ratio(LLR)对数似然率算法^[13],对K关键词进行聚合,生成聚类知识图谱(如图5),右上角标识的聚类模块值Modularity $Q=0.6266(>0.3)$ 代表划分出来的模块度较好,Silhouette $S=0.9196(>0.5)$, Q 、 S 远远大于聚类合理值,代表聚类图的聚类合理性较高。以聚类知识图谱中的聚类名和关键词为参考,

将近十年来我国职业教育政策研究划分为七个研究热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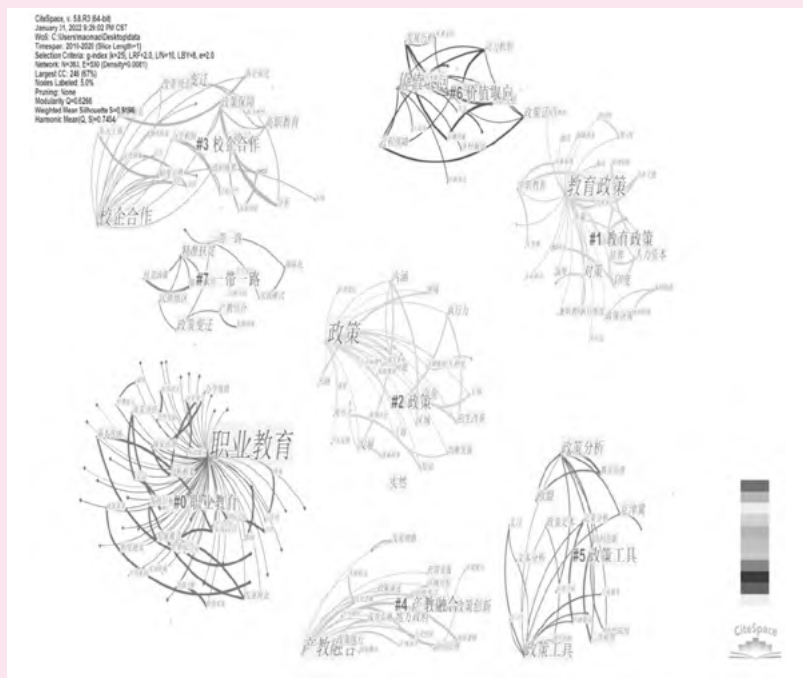


图5 我国职业教育政策研究关键词聚类知识图谱

1. 职业教育政策的历史嬗变及影响因素研究

以#0职业教育、#1教育政策为参考聚类,聚类下的关键词有职业教育、教育政策等。职业教育政策的历史嬗变是学者相当关注的研究热点,不仅研究时间跨度长、文献数量多、且研究内容分支广,涉及产教融合政策、中职教育政策、高职教育政策等诸多职业教育政策。通常设定嬗变起始为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等历史标志性事件,进而以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为嬗变历程,依据重大政策的颁布划分职业教育政策的发展阶段。一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政策嬗变,产教融合政策分为百废待兴的萌芽期、重建发展期、改革探索期及注重内涵质量的创新发展期^[14],二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政策嬗变,1978年邓小平在全国工作会议上提出调整中职教育^[15],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输送建设人才,中职教育政策经历了以扩大规模为重点的发展阶段、规模与质量并行的提升阶段、以巩固提高为主的转向阶段、可持续发展阶段^[16],相比于国家自上而下地推动中职教育发展,20世纪中后期,遵循地方自主探索建立职业技术学院发展逻辑的高职教育才迎来了真正的发展期,其政策大致经历了路径探索与制度供给的初创期(1978—1995年)、调整结构与统筹布局的发展期(1996—2005年)、提高质量与内涵发展的内涵丰富期(2006—至今)^[17],三是职业教育政策历史嬗变的影响因素研究,学者大致从政治、经济、社会、

教育这四方面因素归纳,如曲铁华提出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职业教育政策变迁受经济因素上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政治因素上的政策价值取向、教育因素上的教育发展中心转变影响^[18],而王喜雪提出中职教育免学费政策的变迁既受外部因素如社会经济水平、社会关注度、其他教育子系统的影响,也受内部因素如运行中的困境等所影响^[19],大部分学者持有的观点为:职业教育政策的嬗变主要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政府的价值取向影响,还有学者认为职业教育政策的变迁完全是上述两种因素变化的“缩影”。

2. 职业教育政策的变迁逻辑研究

以#6价值取向为参考点,聚类下的关键词有价值取向、政策话语、动力机制等。一是价值取向,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是决定或支配着教育政策制定主体的价值选择并指向价值目标的活动过程^[20],反映主体价值观念的变化,学者大致认同的变迁逻辑为20世纪90年代前因改革开放的需要,职业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是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效率优先,20世纪末因社会转型,转变为注重长效发展、关注弱势群体的教育公平和教育者实际需求的以人为本,同时蕴含终身教育意味。二是政策话语,政策话语指隐藏在政策目标指向和价值转向背后的价值取向和权力背景^[21],改革开放以来,学者普遍认同话语规则由经济学、政治学话语向社会政策话语、伦理政策话语、教

张毛毛, 张嗣德: 十年历程: 我国职业教育政策研究的热点与回望

育学政策话语等多元话语转变。在政策文本中体现为“……要强化与体制的适应性”“……对于社会主义制度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到“……帮助每个贫困家庭学生顺利完成学业,促进教育公平”“……培养复合型人才培养能力”等。三是动力机制,职业教育政策是一种特殊分配的教育资源,必然存在多元主体价值诉求的不同与利益的权衡博弈,学者认同其动力机制表现为管理权和办学权的转移^[20],管理权从改革开放初的国家的高度集中,逐渐演化为国务院领导下国家宏观政策补给、地方分级管理统筹、社会与市场积极参与的简政放权。办学权则由中央负责到市场经济发展下的联合办学,再到校企行共同办学。

3. 中等职业教育政策研究

以聚类#2政策为参考点,聚类下的关键词有中职教育、免学费、城乡统筹等。学者关于中职教育政策研究有众多面向,一是免学费政策,中职教育真正进入全面免费时代是2012年,从必要性看,实行免费政策既是适应我国经济全球化、产业调整升级亟待源源不断的高素质技能人才输入,同时是稳步推进教育公平的体现^[22],相当一部分中职学生来自农村,因而有利于农村经济振兴、城乡统筹发展。从财政承担主体看,学者们普遍认同中央政府既承担发展中等教育“义不容辞”的责任,又是得益主体,因而经费补给“理所当然”,同时还需经费保障制度及严格监督,以保障经费落到实处,从实施影响看,多位学者认为提高中职教育吸引力的关键是提升办学质量,免费政策的作用有限^[23],或免费政策虽受益于贫困学生,也给予非贫困家庭同样的优惠待遇,并不能促进教育公平^[24],二是中高职衔接政策,贯通中职、高职专科、本科、专业型硕士人才培养立交桥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要求^[25],学者对中高职衔接政策的研究集中于政策制定或监督反馈层面的问题与对策,从政策的制定层面看,缺失权威专门的政策、政策文本表述不清且连贯性不足制约着中高职衔接政策的应然效力^[26],提高政策制定者的素质、因地制宜、一切从实际出发制定政策^[27],不失为“妙计良方”,从监督反馈层面看,我国尚缺乏中高职衔接政策反馈层面明确而详细的规定,政策的反馈环节几乎处于真空状态。国家领导下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反馈过程、建立权责清晰的监督反馈机制,政策将与时俱进地得到反馈进而革新修正。

4. 产教融合政策的研究

以聚类#3校企合作和#4产教融合为参考点,聚类下的关键词有校企合作、产教融合、政策执行、地方政府、成效检测等。《教育部关于2013年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意见》首次将产教融合写进国家文件,此后党的十九大提出“深化产教融合、促进

校企合作”,2017年《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出台,促进产教融合进一步发展。产教融合政策目前研究有以下三个面向:一是问题对策研究,学者普遍指出的梗阻为:“多元主体未形成协同推进的合作格局”^[28],建议主要为“创建多元主体利益合作格局”“建立完善的激励制度”^[29]。二是产教融合政策的执行研究,分为执行的影响因素和成效监测两个层面,从执行的影响因素看,宏观角度学者大多提及了政策文本本身、执行者的素质、执行环境,微观角度则是师资队伍、行企参与度、专业与产业结构匹配度等影响着政策效力。对执行成效的监测是收集执行过程中的数据以衡量与政策目标的一致性并为下一步决策提供依据的活动^[30],明确监测的主客体、完善监测的技术及内容,构建监测指标体系方能提升其科学可靠性,针对我国没有产教融合监测指标体系的窘境,学者罗汝珍构建了3个维度、44个监测点的监测指标体系,为政策成效检测提供可利用的工具^[31]。三是产教融合型企业建设的政策研究,学者关注产教融合型企业的遴选认证与激励,在遴选认证上,《建设产教融合型企业实施办法(试行)》虽出现了目录与试点企业,但欠缺基于区域经济实况的考量^[32],未来还需加以完善。“金融+财政+土地+信用”的组合式激励政策虽成效颇丰,但项目审批、购买服务、金融支持、用地政策等非现金政策还待细化^[33],另外,还有学者提到精神激励政策如树立企业的社会形象。

5. 政策文本分析下的政策工具研究

以聚类#5政策工具为参考点,聚类下的关键词有政策工具、政策文本、政策分析。学者大多是基于具体的政策文本,使用内容分析法构建由政策工具X轴和职业教育发展要素Y轴组成的二维坐标,分析政策工具使用情况及与职业教育发展要素的契合性,政策工具是在执行政策的过程中,公共政策主体为达到预期政策目标采用的方式、手段和途径,主要有三大分类,既有采用体现不同政策对象在物质基础、能力条件、社会地位等方面差异的英格拉姆和施耐德工具理论,也有将职业教育视为无排他性的公共产品继而采用拉米什和豪利特的划分理论,大部分学者结合英格拉姆和施耐德、埃尔莫尔和麦克唐纳尔的分类将政策工具划分为权威工具、象征和劝诫工具、激励工具、能力工具和系统变革工具^[34],如图6所示。在X维度的政策工具上,大多数学者的结论是我国职业教育政策工具使用整体不均衡,存在命令型、权威型或强制性政策工具过溢,系统变革型、学习型、自愿型工具使用不足的困境,而教育发展要素的Y维度上,则是政策工具与教育发展要素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匹配,新时代职业教育亟须创新的发展思路,应善用系统变革型工具促进职业教育

的改革发展,巧用学习型工具实现目标群体对政策的内生性理解。多用自愿型工具吸纳多元主体的意

见建议协同治理。同时注意政策工具的均衡与适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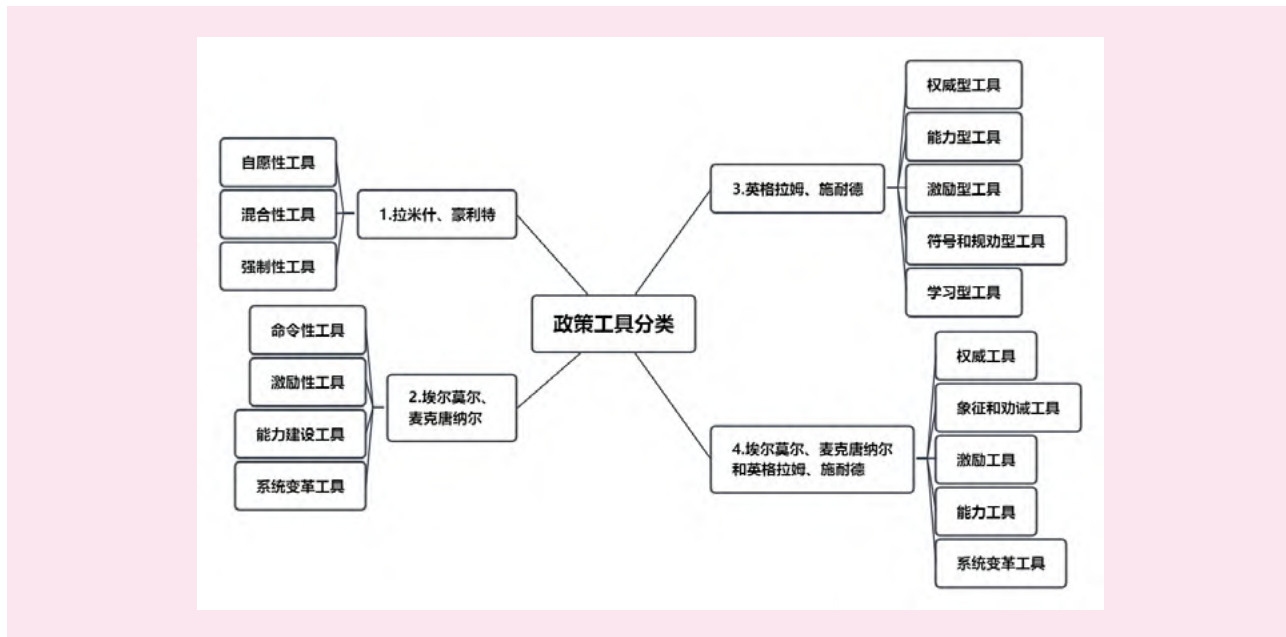


图6 政策工具分类图

6.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政策研究

以聚类 #7 一带一路为参考点,聚类下的关键词有一带一路、国际化。2014 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做出明确规划,即到 2020 年形成产学研深度融合、中高职无缝衔接、职普沟通且体现人的终身教育理念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35]。学者对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政策的研究中,一是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建设性建议,这类研究集中在 2014 年前,彼时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未来发展还处于模糊之中,学者积极建言献策,如设立“专业学位”硕士生培养制度、将职业培训纳入职业教育体系以及构建科研学术支撑^[36];二是保障制度研究,这类研究集中于 2014 年后,如建立校企合作的保障制度、规范责任追究的问责制度、多元主体相互监督制度^[37]。政策的有序推进离不开保障制度的建设。由建设型建议转向保障制度的研究说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制定、实施轮廓渐趋清晰。

7. 国际视野下的经验启示研究

各个聚类中均有涉及,“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以本国发展为中心不代表故步自封。国际视野下的经验启示涉猎较广且倾向于宏观政策的整体介绍,美国联邦政府通过项目资助、教育立法、五年一次的修订实现价值取向从倡导公平向公平与效率兼顾的演变,对我国政府使用经济手段宏观调节、促进职业教育法治建设、回应社会发展思潮有很大启发^[38],澳大利亚在提升职业教育与培训的透明度上,制定职业教育与培训数据政策^[39],收集丰富规范的职业教

育与培训数据对公众信息公开,对我国政策制定以数据库信息为依据之一,数据库反哺政策制定的科学性上有借鉴意义。虽可见一瞥学者的晨钟暮鼓,但比较研究较少,在中外比较研究上,有学者研究了德、美、德国、瑞士等国及主要国际组织的职业教育政策,发现本国现代职教体系构建过程中的问题、制约校企合作的瓶颈以及职教政策治理中的不足,进而提出构建企业职教责任的政策支撑体系、强化地方政府的统筹及创新治理机制等建议^[40]。

六、我国职业教育政策研究的反思

近十年间我国职业教育政策研究硕果累累,研究发展速度和学者关注程度增加,祁占勇、石伟平、孙翠香等作者为该领域的核心作者,合作关系较为丰富,但其他作者间合作匮乏,在研究内容上,形成了七大研究热点脉络,理论研究的丰富对我国职业教育政策的实践乃至职业教育的发展都起到了一定的正向影响,然而无论从研究者及所在机构,还是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研究内容,未来的研究仍有进一步改进的空间。

(一) 过多与匮乏:“开枝散叶的一枝独秀”与“无人问津的寂寥冷清”

首先从职业教育政策研究的核心作者看,核心作者大部分为科研人员和普通高校教师,职业院校教师“形单影只”,科研人员及理论专家进行研究可保障研究的规范和科学,“独占鳌头”实属合理,但对政策执行效果、政策评价最有发言权的职校院校教

师不应寥寥可数,由作者合作图谱可知,研究者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匮乏,虽有合作团体的出现,但集中于祁占勇、孙翠香、石伟平等高发文量学者,其他学者间几乎没有合作,其次在研究的理论基础与视角上,学者在教育学领域开枝散叶,而诸如政治经济学、公共管理学、历史学却鲜少涉猎,职业教育政策复杂多样,仅依靠教育学单个学科的理论 and 视角支持相关研究稍显贫瘠,最后,职业教育政策研究机构的区域多在东部与中部,西部仅有一所,东部中部在研究基础上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如经济发展水平和先前科研基础,但西部也有值得深入探讨的研究问题,东西部的跨区域研究尚待改善。

(二) 应然与实然:理论研究未“对位”实践需要

在研究方法上,思辨性研究几乎以压倒性的优势遮蔽了实证研究,学者笔耕不辍,倾向于以理论思辨的方法探寻、归纳和展望,对职业教育政策的分析以话语分析和修辞分析为主,但心与心之间沟通的质性访谈、以问题获取研究对象信息,研究结果可测量的问卷调查、以及综合使用不同研究方法的混合研究法“屈指可数”,研究方法是挖掘的工具,“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仅以理论思辨为工具,必然无法采撷实证研究领域的果实。在研究内容上,我国职业教育政策研究有七大研究热点,这七大热点仍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一是学者对职业教育政策发展轨迹的描画较多,但研究阶段的划分具有同质性,学者大多以重大政策的颁布为阶段划分点,忽视了职业教育政策的发展是连续演进的过程,往往没有一个具体的阶段,且划分的时间段也大体相同,造成了研究的重复,不利于学术思想争鸣。二从演进逻辑看,仍有相当一部分研究认为职业教育政策完全随国家的经济环境而演变,以政府为导向,我国职业教育政策在前期的价值取向的确以经济学话语为主导,尤其是改革开放初期,但应注意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国家逐渐注重多元治理及人的中心地位,同时,职业教育政策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不能片面地归结为国家经济、政治发展的附属物。三是政策工具的划分上,虽有三大政策工具划分理论,但学者往往倾心基于研究目的混合两大政策理论进而划分研究工具,没有统一的标准,因而在分析上呈现工具使用混杂的局面,四是宏观研究充分,但微观研究不足,对政策整体演进及发展轨迹的宏观研究较多,但涉及中等职业教育政策、产教融合政策等具体政策时,其微观层面的问题对策研究中,问题的提出和对策建议都较为宽泛,显得“头重脚轻”。

(三) “获”与“惑”:“南橘北枳”还是“博采众长”?

国际视野下引进他国发展经验必不可少,学者的晨钟暮鼓可见一瞥,但引进和借鉴,不止停步于“引”和“借”,更深一步应是“进”和“鉴”,近十年间,

学者的研究前沿虽越来越倾向于比较研究,但仍有大量未基于本国国情、发展阶段、发展实况的他国经验介绍,各个国家职业教育的发展阶段并不相同,没有基于政策制定主体、政策执行过程、执行效果反馈监督及保障制度等具体条件的比较,其启示的可行性有待进一步探究,此外,有的学者仅介绍了国外某个具体政策的缘起、演进与现状,并未和本国职业教育政策的发展建立关系,虽拓宽了国际视野,但不免“获”与“惑”并存。

七、我国职业教育政策研究的展望

(一) 合作与互补:“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正如生命历程研究与公共政策形塑联结的倡导者——约翰·H. 劳布所说,真正的研究应建立以实践者需求为中心的研究关系,职业院校教师既是职业教育政策一线的实践者,也应是行动导向的研究者,他们和政策研究专家、学者的沟通、交流与学术观点的碰撞既利于宏观上职业教育政策的制定,又利于微观上职业院校对政策的贯彻实行,研究者与实践者的双向沟通或研究者本身成为实践者才能实现真正的研究,也才能真正地回答实践对理论的质询。该领域已有的学者在未来的研究中应加强合作,促进资源的共享和凝聚研究聚合,学者间的合作不仅可以减少重复研究和研究断层,还可扩大研究影响力。各个机构和区域间的交流合作同样有助于职业教育政策研究再攀新高峰,最后,政治经济学、公共管理学、历史学等学科的视角将提供职业教育政策研究不同的思路和建议。

(二) “在其位”与“安其所”: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

服务职业教育实践是职业教育政策出台的真正目的所在,职业教育政策理论研究应不断跟进实践发展,而不是“理论研究深陷理论窠臼”,“磨刀不误砍柴工”,从职业教育政策制定、执行的客观实际出发,首先应注意研究方法的合理使用,以修辞分析与话语分析进行政策文本的理论思辨研究虽“有理有据”,但收集观察资料、统计实证数据的量化研究、关注人文性的质性访谈,都有其独特和优势之处,提高研究的实效性,重视实证研究,使研究中不仅有经验总结、事实描述、理论思辨,还有数据分析、访谈交流。其次在研究内容上,一是描绘政策的发展轨迹虽可“鉴往知来”,但应有不同的划分依据和轨迹描绘,过于笼统的阶段划分反而会掩盖政策的嬗变轨迹,二是演进逻辑,职业教育政策虽与政治、经济水平密切相连,但有其自身发展规律,应将政策自身本身和外部因素结合考察其变迁,另外,近十年间学者重点研究在政策嬗变和变迁逻辑,未来研究更应将重心放在政策教育政策的过程研究,即政策制定、执行和

检测评价的过程,实现应然与实然的连接,最后,微观层面的问题和对策研究,不应只指出普遍宽泛的问题,进而提出“放之四海皆准”的建议,有待基于实证进一步验证问题和细化建议。

(三)移植与生长:因时制宜方能生根发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从国家统一管理的计划经济走向多元主体利益的市场经济,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速度”,有自身的发展特点。职业教育政策研究最早起源于西方的美国,中国作为“后来者”,不可避免地存在对国外研究范式的引进,但应注意的是,教育与政治制度、经济体系甚至社会文化密切相连,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包括私人经济在内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条件下运行的市场经济、古代重农抑商的文化传统,都决定了中国的职业教育需建立一条适应自身发展的特色之路,因此在借鉴的过程中,应根据本国职业教育发展阶段对职业教育政策的要素对比分析,而不仅停留在单个政策发展经验的引进,“以我为主,博采众长”,方能促进其本土化的发展。

参考文献:

- [1] 张懿,王军.关于“十三五”时期高职院校创新发展的思考[J].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学报,2017(1):52-57.
- [2] 任怡平.新时期我国职业教育改革的应然转变与发展指向——基于《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背景[J].成人教育,2020(10):59-64.
- [3] 黄蘋.2000-2016年我国实训基地研究可视化分析——基于citespace知识图谱[J].职教论坛,2017(6):86-92.
- [4] 倪娜.我国智库研究演进路径、热点与趋势分析——基于Citespace的文献计量分析[J].晋图学刊,2019(6):67-72.
- [5] 张长青.对湖北高职院校体育教学满意度的调查与分析[J].当代体育科技,2015(26):208-209.
- [6] 祁占勇,王羽菲.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的变迁与展望[J].中国高教研究,2018(5):40-45.
- [7] 贾洪洲.青少儿余暇体育研究回顾与展望[J].运动,2017(14):38-39.
- [8] 巩红,常腾,张渊雨.《西安邮电大学学报》发表论文可视化分析[J].西安邮电大学学报,2019(4):81-87.
- [9] 叶文,郑刚.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研究现状分析与未来展望——基于CiteSpace的可视化分析[J].贵州师范学院学报,2019(8):47-57.
- [10] 侯洁,张茂聪.中国特殊教育研究发展现状与问题——基于CNKI学术期刊2007-2016年特殊教育主题文献的可视化解读[J].中国特殊教育,2017(4):34-40.
- [11] 王术.近年我国图书馆数字资源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19(24):143-146.
- [12] 朱会,魏瑞斌.国内科研政策研究热点分析[J].农业图书情报学报,2020(3):20-28.
- [13] 倪好,蔡娟.近二十年国际创业教育研究的进展、热点与走向——基于WoS期刊论文的可视化分析[J].比较教育研究,2018(2):26-35.
- [14] 古光甫,邹吉权.新中国70年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变迁逻辑与发展理路[J].成人教育,2020(8):59-66.
- [15] 李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政策:发展历程、变迁逻辑及未来展望[J].继续教育研究,2018(11):93-98.
- [16] 刘淑云,祁占勇.改革开放40年我国中等职业教育政策的演进逻辑与展望[J].职教论坛,2018(7):66-74.
- [17] 王佳昕,祁占勇.改革开放40年高职教育政策的演进逻辑与展望[J].中国高校科技,2018(11):72-76.
- [18] 曲铁华,李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职业教育政策影响因素及特征研究[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4(1):74-79.
- [19] 王喜雪.我国中等职业教育学费政策变迁的动力因素分析[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4(33):5-11.
- [20] 祁占勇,王佳昕,安莹莹.我国职业教育政策的变迁逻辑与未来走向[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8(1):104-111+164.
- [21] 潘姿曲,祁占勇.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国职业培训政策的变迁逻辑与未来走向[J].职教论坛,2018(11):68-74.
- [22] 徐桂庭.免学费政策的实施对中等职业教育吸引力的影响分析[J].职教论坛,2011(31):9-12.
- [23] 王蓉.应放缓全面实施中等职业教育免费政策[J].教育与经济,2012(2):1-6.
- [24] 蔡文伯,高睿.支持联盟框架下中等职业教育免费教育政策的社会效应分析[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7(9):37-43.
- [25] 吴立波,吴回生.职业资格制度改革与职业教育的关系研究[J].职业教育研究,2018(9):59-62.
- [26] 刘爱英.中高职教育衔接的政策诉求[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4(11):30-35.
- [27] 孟源北.中高职衔接关键问题分析与对策研究[J].中国高教研究,2013(4):85-88.
- [28] 于志晶,刘海,程宇,等.“十二五”以来我国职业教育重大政策举措评估报告[J].职业技术教育,2017(12):10-32.
- [29] 贺书霞,冀涛.高职教育产教融合政策实践偏差的表现、成因及对策[J].教育与职业,2020(12):19-26.
- [30] 曹珍,罗汝珍.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的执行成效研究——基于2019年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质量年报分析[J].成人教育,2020(3):54-60.
- [31] 罗汝珍.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执行成效的监测研究[J].职业技术教育,2020(9):39-44.
- [32] 地方产教融合型企业政策实施:基于试点企业的分析——以嘉兴市教育型企业为例[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0(19):39-43.
- [33] 侯芸子.产教融合型企业的政策分析及几个重点问题的思考[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9(18):17-20.
- [34] 李运华,王滢淇.新时代我国职业教育政策分析——基于政

- 策工具视角[J].教育与经济,2018(3):24-30.
- [35] 陈衍,李阳,柳玖玲,等.地方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政策移植与创新[J].现代教育管理,2019(2):102-107.
- [36] 薛栋.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四重理论向度及其思考——基于国外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相关政策分析[J].职教论坛,2013(19):50-53.
- [37] 马建富.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的制度配置与政策创新[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2(7):68-72.
- [38] 刘旭东.大众化以来美国联邦政府职业教育政策价值取向的历史变迁[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3):129-135.
- [39] 吴雪萍,周婷婷.澳大利亚国家职业教育与培训数据政策探析[J].比较教育研究,2019(1):100-106.
- [40] 曾东升.中外现代职业教育治理政策比较研究——企业责任与作用[J].教育学术月刊,2017(5):29-37.

[责任编辑:陶济东]

Ten-year Course: The Focus and Retrospec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Policy Research in China

——Visual analysis based on core documents from 2010 to 2020

Zhang Mao-mao, Zhang Si-de

(Tianjin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222)

Abstract: vocational education policy is a specially allocated educational resource, and its research will guide and manage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policy. Taking the papers from 2010 to 2020 in the core of Peking University of China Knowledge Network (CNKI) and CSSCI database as the data source, this paper makes statistical analysis on the number of papers, research authors and keywords and draws the map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through the methods of bibliometrics and visual knowledge map.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in recent ten years, the development speed of this field and the importance attached by scholars have generally improved; the types of core authors are college teachers or researchers, who work mainly in universities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es; there are seven research hotspots: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change logic,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policy,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policy etc.; future research should promote cooperation and resource sharing between different researchers, institutions and regions, and comply theoretical research with practical needs, and introduce development experience by comparing the development elements of home and other countries.

Key words: vocational education policy; knowledge map; keywords; clustering